

6 | 文摘

亲历者回忆中国首次原子弹试验

50年前(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我们采访了当时的亲历者,让他们讲述原子弹的那些事儿。这些淡泊名利的耄耋老人,当年肩负着最危险最艰巨的核试验使命,风餐露宿,舍生忘死,并且保守机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即使后来转业到地方,也依然守口如瓶。

原子弹爆炸5分钟后,他驾驶飞机勇闯蘑菇云

李传森:40年后,女儿看电视才知道我开的飞机

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5分钟后,一架飞机勇闯蘑菇云成功取样,获得了宝贵的试验材料。当年37岁的李传森,就坐在这架飞机副驾驶的位置。

回忆执行任务的情景,老人眼中泛出激动的光芒:“只见一个大火球仿佛火红的太阳,‘轰’一下跃出了地平线,辽阔的戈壁滩上,出现闪光、火球、烟团、蘑菇云,伴随着轰隆隆的巨响和狂风,四周通明雪亮,壮观无比。”

来不及欢呼胜利,5分钟后,李传森和其他5名机组人员,驾驶飞机,飞至规定的7000米上空,准时进入蘑菇云。“当时我看到的蘑菇云的颜色是白色加灰色。”李传森

说,飞机钻进去后,周围是白茫茫的一片,只能看仪表飞行。飞机在蘑菇云里一共穿越了三次。

李传森下了飞机,立即脱下防毒面具和身上的衣服。“整个飞机都被污染得厉害,地面上的化学部队测量了一下,仪器一下子就顶满格了!”

就在原子弹爆炸前,李传森和其他机组人员进行了一系列训练。“执行任务之前,我们6个人将党费都交了,就没想着活着回来!”

出生入死,李传森圆满完成“穿云取样”,但这一英雄壮举,他未曾向任何人提起。直至40年后,他的女儿看电视,家人这才知道,开飞机穿越蘑菇云的李传森就是他。

她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祝贺电话

常淑英:住的是帐篷,喝的是苦水

1963年,常淑英和丈夫刘海清双双被调往核试验基地工作,来到了马兰。当时这里还都住的是帐篷,喝的是苦水,生活非常艰苦。

虽然是两口子,但一到基地他们就分开了,相距数百公里,几个月都不能见面。丈夫刘海清在基地试训部任参谋,她被分到通讯二分站做接线员。

为了做好原子弹爆炸的通讯保障工作,通讯连经常展示竞赛,苦练技术。常淑英还练出

了一种特殊本领,那就是“听音辨人”。她熟悉不同领导的不同方言及工作习惯,耳灵手快,快捷高效,专门负责总理专线和备用线。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总理专门给马兰基地总机打来电话表示祝贺,接线员正是常淑英。

听到总理的祝贺,机房里的姑娘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大家互相拥抱,欢呼雀跃,有的拍手鼓掌,有的放声高唱,有的热泪盈眶……

蘑菇云升起时,他开着第一辆卡车冲进爆炸现场取样

吉元望:每天在70℃高温下训练5个小时以上

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时,承担着回收取样这项艰巨任务的负责人名叫吉元望,郑州人,在核试验基地奋战了22个春秋,多次组织参与核试验的运输、布点、取样、回收等工作。

经过实测,一次取样从出发到完成需要4个小时以上。战士们

戴防毒面具、穿橡胶防护服每天在烈日下连续行走5个小时以上。吉元望说,七八月份的戈壁滩温度高达70℃,防护服不透风,穿上就像进了蒸笼。“穿上防护服后,1个小时后感觉两颊发疼,2个小时后头疼,3小时后胃疼,4小时后全身麻木了。每次训练结束后,

战士们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脱掉防护服往下一倒,仅汗水就能倒满一茶缸。”

吉元望自豪地回忆,蘑菇云升起时,他开着第一辆卡车冲进爆炸现场。当时参与取样车辆1000多辆,没有一辆车跑错位置,没有一辆车在沾染区抛锚。

戈壁徒步巡逻8000里

王万喜:沙漠里3人合喝一支葡萄糖保命

为保障原子弹研究与试验顺利进行,当年7名军人在茫茫沙漠中徒步巡逻8300里的壮举,如今依然令人动容。其中有一名军人名叫王万喜,七人小分队副队长。郑州新密人。

王万喜介绍说,出发前,基地副司令员张志善接见他们,指示

他们用半年时间,徒步行走8300里,对核爆中心东侧罗布泊湖等区域进行巡逻。具体执行3项任务:一是防止敌对空投搞破坏,二是查清场区外围的地形地貌,三是清出场区范围内的流动人员。

王万喜最难忘的是巡逻到

楼兰古城,原以为当晚就能赶回来,不巧路途难走,沙丘连绵,当天下午才到古城。带的水已用完,只剩下3支葡萄糖液剂,战友们互相推让,谁也不肯喝。为此3名党员开了小组会,决定4名团员每人两人喝一支,3名党员喝一支。

参与制订首颗原子弹装配方案

刘海清:脱下的防护服里倒出半盆汗水

原子弹爆炸前,能否顺利爆炸便是提前需要考虑的问题。学过通信专业的郑州人刘海清,曾参与解决这一方案。

“当时我们既没见过原子弹,也没资料可以参考。”刘海清表示,对于刚组建的“三处”来说,这项工作困难重重,他们只能“闭门

造车”。刘海清等人拟订了两个方案,但均被退了回来。没过多久,接触到原子弹的防化兵处参谋向他们简要介绍了一些原子弹的原理、结构的名称和用途。根据这些信息,刘海清等人又加班加点做出了第三稿,司令部审定后终于通过。

成功爆炸后,指挥部组织力量回收仪器。刘海清主动请缨,穿着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赶到距离爆炸中心东侧1000米的地下室内帮忙。刘海清说,当时清洗时,脱下的防护服里倒出的汗水足有半盆。

(摘自《郑州晚报》)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试验人员欢呼雀跃。

看到了洋人的先进技术却不敢用,修建了铁路却用骡子拉车皮——

天朝上国面子让清朝洋务运动举步维艰

从李鸿章1872年提出修铁路到慈禧1889年同意,中间经过了17年。清王朝始终坚持自己天朝上国的面子,总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才愿意做一点点改变。

1881年开平矿务局修建的中国第一条准轨铁路——唐胥铁路通车后,清直隶总督李鸿章率幕僚乘车视察。

洋务运动是清廷学习西方器物以图自强的一场自救运动,但是清政府有心理障碍,觉得夷狄的东西我们不能用。

李鸿章1872年第一次正式提出来,跟恭亲王说要修铁路,他觉得修了铁路对运兵很有好处。恭亲王也觉得应该修,但是阻力太大了,不敢提出来,后来李鸿章提了,结果一片反对之声,谴责他的说他是“汉奸”。李鸿章每次的奏折都说修铁路会带来利益,哪儿修铁路,哪儿就发达。反对的人说,这正好证明了铁路修到哪里,哪里人心就变坏,铁路经过的地方,淳朴的民风会变坏。还有人说,厚朴的民风会变坏。还有人,他在上报给朝廷的时候得用一些中国人最熟悉的词来报告一个新事物,说修了新马路,因为确实没有规定这种东西必须叫做铁路,朝廷也没有介意。

李鸿章也没有用蒸汽机拉煤,而是用几匹骡子拉一个车厢,车厢里有煤,在铁轨上拉了9.8公

里,完了再卸下来。他想要个适应过程。但是负责修唐山煤矿和小铁路的英国工程师一看觉得太荒唐了,你修了铁轨,却用骡子拉着车皮。他觉得这是中国政府没有钱,买不起蒸汽机车,正好唐山煤矿有个锅炉,当时没有用,他没有向李鸿章汇报,把它改装成一个蒸汽机车弄到铁轨上了,铁轨上拉了长长的车皮,还装满了煤,这是1880年的事。但蒸汽机轰鸣,把大多数人吓得魂飞魄散,觉得这是妖魔鬼怪,马上就报告给了朝廷。这下朝廷知道了,原来你李鸿章是修了一个铁路用来运煤,就让李鸿章把铁路拆了。李鸿章打马虎眼,他知道政府最忌讳的就是蒸汽机车,他就把蒸汽机车撤掉,又恢复到用骡子拉车皮。

电影《子弹飞》用的就是这个情节,电影里的情节不是编出来的,这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是多么艰难。然而1884年中法海战中,整个福建水师被打沉,暴露出了清政府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现代化的军舰,都是沿江沿海一些地方官,买一些帆船,让几个熟悉水性的士兵在帆船上,主要是防河盗江盗海盗,当时水师就是这样水平。

但是鸦片战争以来,列强都是在海上使用军舰侵略,曾左李或者沿海的督抚都用自己地方的钱从英国、法国或者是德国买来现代化的军舰,组建了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与福建水师。而且,左宗棠、李鸿章意识到一个

问题,我们有现代化的舰队,还需要一个海军司令部来统一指挥。所以左宗棠首先打报告说,朝廷应该成立海军衙门,所谓海军衙门,就相当于现在的海军司令部,李鸿章也提出来,几支舰队建成了,应该统一管理。但清廷拒绝了,他们认为,我用夷狄的军舰都已经是在等而下之,不得不这么做,很丢人,你还要让我在政府机构抓这个跟朝廷上奏折,说一定要建海军衙门,朝廷到现在才知道建海军衙门的重要性,才同意了。这个事情也说明了清王朝的变革总是非常被动的。像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是多么忠于朝廷的大臣,他们拿地方自己的钱建立舰队,说应该由清廷来指挥,他不指挥,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非要一个舰队被打沉了,才同意建立一个海军衙门。

海军大臣相当于现在的海军司令,慈禧当然用了她最信任的醇亲王奕譞来当海军大臣。他一上任,李鸿章就对他说,我的北洋水师很强大,请你到天津来视察北洋水师。奕譞一视察北洋水师,他没想到现代化的军舰这么厉害,大炮打得又很准,海浪那么大,他觉得站在军舰上非常威风。李鸿章就借这个机会说,为什么



1881年开平矿务局修建的中国第一条准轨铁路——唐胥铁路通车后,清直隶总督李鸿章率幕僚乘车视察

军舰能在海上跑那么快,就因为要靠锅炉的动力来推进。但是我们这一次检阅用的煤骡马车,你要打起仗来,还用骡子拉煤吗?跟不上,这些话,这些军舰在港口等着挨打。

奕譞曾经也是反对修铁路的,这时候他才明白修铁路运煤的重要,李鸿章就跟他建议说,你应该用海军的名义给朝廷打报告,中国应该大规模修铁路。奕譞说,我现在提了,反对的力量会很大,现在不是时候,但是我支持你,你先把到唐山的铁路抓紧时间修。有他的支持,李鸿章也不用打报告,大张旗鼓就这么修起来了,把这一段铁路就修到了天津,北洋水师的码头。1888年醇亲王

奕譞觉得时机成熟了,他用海军司令部的名义给朝廷打了报告,说军队有个军舰,有了码头,需要修铁路运到码头。这个奏折就到了朝廷上,慈禧让各位大臣讨论,应不应该修铁路。因为奕譞权力很大,这时候反对的和赞成的意见就各半了。

这时候地方大臣张之洞就出来表态了,他觉得应该修铁路。在诸多大臣的赞成下,慈禧在1889年下令全国修铁路。从李鸿章1872年提出来到慈禧1889年同意,中间经过了17年。清王朝始终坚持自己天朝上国的面子,总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他才愿意做一点点改变。

(摘自《北京日报》)

—— | 掌故 | ——

“执牛耳”——在古代只是个主持人

现代汉语将“执牛耳”解释为在某一方面居领导地位的人,而在古汉语中却不过是个主持人。

这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哀公十七年》:“诸侯盟,谁执牛耳?”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订立盟约要举行一项隆重的仪式:先在地上挖一土坑,将牛(称之为牲)置于其中,割下牛左耳,以盘盛之,再取牛血以容器盛之。此即所谓执牛耳。

执牛耳是否由大国盟主担当呢,非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且诸侯盟,小国必有尸盟者,楚为晋细,不亦可乎?”尸是主管、主持的意思,尸盟即主盟。所谓尸盟者,即负责盟会中大小事务的官员,一般由较小一国的大夫担当。《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公会齐侯盟于蒙,孟武伯相……武伯问于高柴曰:‘诸侯盟,谁执牛耳?’季羔曰:‘鄙行之役,吴公子姑曹,发阳之役,卫石魋。’武伯曰:‘然则谁也。’”这段话意思是,鲁哀公与齐平公在蒙地会见并结盟,鲁国大夫孟武伯为襄礼。孟武伯问高柴:“诸侯结盟,谁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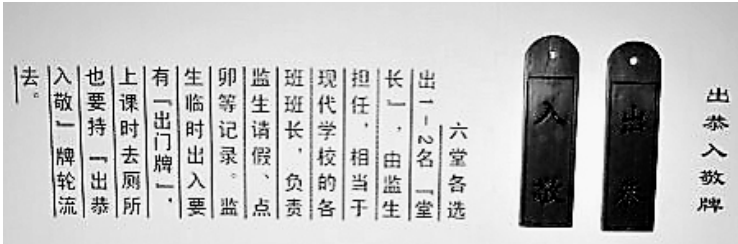
执牛耳一职?”季羔(即高柴)说:“鄙行之盟,由吴公子姑曹执牛耳;发阳之盟,则是卫大夫石魋。”孟武伯说:“那么这次就该我(孟武伯名魋)执牛耳了。”“鄙行之盟,《左传》未有详文。发阳之盟,乃鲁、宋、卫三国结盟,卫侯定非盟主,故由卫大夫石魋执牛耳。这次蒙之盟,齐大夫鲁小,齐国自当盟主,所以鲁大夫孟武伯理所当然为尸盟者执牛耳了。试想,执牛耳者双手托着一盘猩红的牛血,毕恭毕敬地向各国诸侯逐一奉饮。这样的角色,贵为诸侯盟主又怎肯为之一。”

在诸侯国盟会中,国家强弱大小的地位是以歃血之先后来体现的,称霸诸侯的盟主当然是首先歃血。《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晋楚争先。晋人曰:‘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这里说的“争先”,就是争歃血之先。当时晋国称霸已久,怎肯让楚国首先歃血,大国盟主的地位溢于言表。

由此观之,“执牛耳”是主盟而非盟主。(摘自《广州日报》)

“出恭”——

原指出入要恭敬



我们知道,“恭”是个褒义词,无论是恭候、恭谨、恭请,还是恭贺、恭维、恭喜,都是尊敬的意思。那么,怎么把含有恭敬之意的“恭”字与具有如厕之意的“出恭”一词扯到一起呢?

这要从明代的科举考试开始说起。

明朝盛行的科举考试,要比今天的高考更为严格。除了监考不是一般的老师而是朝中的大臣外,光从皇帝亲自巡视考场这项看,它的意义就非同寻常,重视的程度也可想而知。

由于考试时间过长,考生需要方便的事在所难免。为了便于管理,考场设置了“出恭入敬牌”,凡需要出去方便者,要申请此牌,托于胸前,到指定地点去解决,速战速决,回来后交牌归位。

从这个牌的字面上看,“出恭入

敬”,就是出入要恭敬,要遵守纪律,轻去轻回,快去快回,不得喧哗吵闹,干扰他人。这也体现了对皇上殿试的尊重和恭敬。

虽然这个牌子是表示出去进来都要恭敬的意思,但牌子的目的必定是用于如厕方便的。这事流传到社会上,大家都把人厕视为“出恭入敬”了。为了口头上表达的方便,人们干脆摘取“出恭入敬”的前两个字,这样,“出恭”一词便流传开来。

“出恭”既然是如厕,善于引伸的国人于是就把大便叫“大恭”,小便叫“小恭”,没屎没尿大小都不需要方便的放屁,则称为“虚恭”,就连便溺之桶也被称为“恭桶”了。这样,带有恭敬之意的“恭”字便有了他意,与厕所卫生间连在一起,服务于民了。

(摘自《广州日报》)

清宫问候语——

“吉祥”上不了台面 “老佛爷”不能当面称



官员们无论见皇帝或太后,都是跪安,口中是:“臣xx请皇太后圣安。”不能叫“老佛爷”,当面必须称其为“皇太后”。

在太多清代影视节目中,“老佛爷”语汇不绝于耳。对着慈禧太后,不仅一口一个“老佛爷”,还加上“吉祥”二字。今天听来,倒是蛮不错的称颂恭维话。可其实,清时对慈禧太后,是不能这么随便乱说乱叫的。

著名文物学者朱家潘先生在这个今天常用的语汇。原来,当时官员们见太后时,如今天影视中一面叩头一面说着“老佛爷万寿无疆”之类的话,是没有的。官员们无论见皇帝或太后,都是跪安,口中是:“臣XX请皇太后圣安。”不能叫“老佛爷”,当面必须称其为“皇太后”。太监在“该班”(值班)时,太后从屋里走出来,太监只须垂手侍立,不需行礼,无须废话。如果太后问话,太监要立刻跪下回话。如果太监主动进门奏

事,一进门先跪安,说:“奴才xx请皇太后圣安”,并非如今天影视中说什么“老佛爷吉祥”之类的话。

“老佛爷”这个语汇,当时也是有的。可那是太监和内务府的一些在皇宫中办事的官员们背地里对西太后的一个代词。但当面还是称“皇太后”。那些大臣们,无论当面或背后,都是不叫“老佛爷”的。

至于相互道“吉祥”这样的问候方式,只是太监们彼此之间见面问候时说的话,是不能大能上“台面”的。不仅见太后不能这么说,见大臣们也没有这种规矩。可能有部分内务府的低级官员染上了这种习气,见到地位较高的太监,为表示彼此亲近,是“自己人”,就用太监间相互问候的方式道一声:“xx老佛爷吉祥”。

封建时代,尤其宫廷,不少语言都有“层级”讲究,分寸有度,大有区别,不能乱用的。(摘自《人民政协报》)